

# “全球南方”参与全球安全治理 的路径、动力及影响<sup>[1]</sup>

陈翔

【内容提要】“全球南方”是影响世界政治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推动全球安全治理演进的强大动力。“全球南方”从二战结束以后的南方国家发展而来，主要包括77国集团与中国。冷战结束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全球南方”成为全球安全治理的积极推动者。“全球南方”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路径体现在通过联合国等正式国际组织平台、“大金砖”合作等多边机制、“全球南方”区域组织以及“全球南方”国家与区域组织的跨区域治理网络等方式推进全球安全治理进程。“全球南方”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动力包括“全球南方”国家对战略自主的重视度上升、“全球南方”国家的实力增长、安全威胁的持续存在与既有全球安全治理的深度赤字以及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重大事件的推动等。“全球南方”对全球安全治理的演进具有多重影响，涉及安全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与民主化、安全治理范式的区域转向以及安全治理方式的多边主义趋势。

【关键词】全球南方 全球安全治理 国际安全 安全格局 南南合作

【作者简介】陈翔，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 (2024) 04-0152-23

[1] 本文系北京市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视角下中国参与区域安全公共产品供给研究”（项目编号：21ZGC007）的阶段性成果。作者感谢《和平与发展》匿名评审专家及编辑部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中错漏概由本人负责。

进入 21 世纪以来，“全球南方”（the Global South）正在成为关注焦点，“全球南方”的崛起是大变局时代国际政治最有影响的事件之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2013 年人类发展报告》强调指出，“全球南方”的崛起在速度与规模上都是前所未有的。<sup>[1]</sup>有学者指出，“全球南方”成为全球政治与知识发展的新趋势，旨在超越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sup>[2]</sup>2023 年 1 月，“全球南方国家之声”线上峰会举行，共有 125 个国家参加，讨论的议题涉及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方面。2023 年 2 月，慕尼黑安全会议专门设立“南北合作”议程，《2023 年慕尼黑安全报告》提及“全球南方”的次数有 55 次。2023 年 5 月，七国集团峰会邀请印度尼西亚、越南、科摩罗群岛等“全球南方”国家，把“加强与全球南方的联系”作为会议的两大议程之一，且强调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在贸易、外交与安全等领域的合作。2023 年 9 月，“77 国集团和中国”峰会在古巴哈瓦那举行，主张深化“全球南方”国家的团结合作。<sup>[3]</sup>2023 年 10 月，新一轮巴以冲突发生以后，“全球南方”国家积极发声，普遍认为冲突没有赢家，和平没有输家，巴以双方必须立即停火止战，暴力冲突只会引发新的仇恨，“两国方案”是解决巴以冲突的根本出路。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及相应合作平台的搭建，“全球南方”成为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重要力量。进入新世纪以来，南南合作逐渐强调全球安全领域的合作。尤其是 2022 年 2 月乌克兰危机升级以后，“全球南方”国家在政治与安全问题上展现出更加明显的自主性与能动性，政治崛起成为“全球南方”受到更大关注的重要推力。习近平主席在 2024 年 6 月向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

[1] The UNDP,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3: The Rise of the South, Human Progress in a Diverse World*,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2013, p.11.

[2] Annamária Artner and Zhiguang Yin, “Towards a Non-hegemonic World Order—Emancipation and the Political Agency of the Global South in a Changing World Order,”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44, No.10, 2023, p.2195.

[3] 77 国集团成立于 1964 年，是发展中国家加强团结合作与促进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际机构。1991 年，中国与 77 国集团第一次以“77 国集团和中国”的方式共同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筹备会上提出立场文件。2000 年，“77 国集团和中国”首届首脑会议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截至 2024 年 1 月，77 国集团共有 133 个成员。

议成立 60 周年庆祝活动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时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的一员，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sup>[1]</sup>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中国是南南合作的积极倡导者、“全球南方”事业发展的有力推动者与全球安全治理的重要参与者。本文着重探究“全球南方”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路径，分析百年变局加速演进背景下“全球南方”积极推进全球安全治理的动力及影响，为学界和实务界探索中国依托“全球南方”合作框架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方式提供参考。

## 一、“全球南方”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路径

就概念的发展脉络而言，“全球南方”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其本身既具有地理属性与经济属性，也具有相应的政治属性。相对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等概念，“全球南方”术语在冷战时期并没有得到显著的重视。最先提出“全球南方”概念的是美国学者卡尔·奥格尔斯比（Carl Oglesby），他在 1969 年用“全球南方”表述反殖民主义力量。自 20 世纪 80 年代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南方”变成一个可接受的重要术语，用来指代以前的第三世界国家。<sup>[2]</sup> 英国历史学家贝尔克·汤姆林森（Belk R. Tomlinson）认为，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全球南方”等术语被引入，指以前“第三世界”所描述的地区和经济状况。<sup>[3]</sup> 新世纪以来，“全球南方”概念成为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时兴词汇。有学者强调，“全球南方”一词盛行于 21 世纪初，以表明冷战结束后新的地缘政治安排。<sup>[4]</sup> 可以看出，“全

---

[1]《习近平：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的一员，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人民网，2024 年 6 月 13 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4/0613/c1001-40256008.html>。

[2] Jacqueline Braveboy-Wagner, ed., *Diplomatic Strategies of Nations in the Global South: The Search for Leadership*, New York, NY: Springer, 2016.

[3] Belk R. Tomlinson, “What Was the Third World?”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38, No.2, 2003, pp.307-321.

[4] Nour Dados and Raewyn Connell, “The Global South,” *Contexts*, Vol.11, No.1, 2012, pp.12-13.

球南方”继承了冷战时期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等概念，但是有着相应的转变，“全球南方”不只是欠发达的隐喻，更是表达历史上被压迫的特定国家群体的现实能动性。“全球南方”并非国家之间官方的政治集团，也非正式的国际组织，而是包括不同历史文化传统、基本价值理念、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各自利益诉求的国家群体，但是这些国家拥有追求经济发展、要求公平正义以及政治独立自主等共同特征。根据南南合作金融中心的界定，“全球南方”包括 77 国集团与中国。2004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打造“全球南方”》报告将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南方国家称为“全球南方”国家。

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全球南方”是从 20 世纪 50 年代的“南方”演化而来。1955 年，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是南方国家在全球政治舞台展现自身独立姿态以及多边合作的开端。万隆会议是南南合作被视为全球政治运动的里程碑，旨在挑战北方主导的政治与经济体系。<sup>[1]</sup>万隆会议讨论了世界和平问题，提出用和平方法解决一切国际争端、不干涉他国内政、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联合自强汇聚了强大合力，为国际秩序改革和完善贡献了历史智慧。<sup>[2]</sup>同时，万隆会议是南方国家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重要时刻。但是在整个冷战时期，美国是国际安全体系及全球安全治理的主要推动与塑造力量，美苏的大国竞争使得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受到严重压制，包括联合国维和行动在内的治理行动均被大国权力政治所束缚。冷战结束以后，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全球南方”参与全球安全治理进程加快。其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路径重在强调通过“全球南方”国家与“全球南方”区域组织等载体，基于相应的范式与理念，探索促进区域及全球安全问题解决的具体方式，主要体现为以下几方面。

---

[1] Kevin Gray and Barry K.Gills,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Global South,”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37, No.4, 2016, p.557.

[2]《习近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7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全文)》，中国政府网，2024 年 6 月 28 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6/content\\_6959889.htm](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6/content_6959889.htm)。

## （一）“全球南方”国家通过联合国等全球性国际组织平台推进全球安全治理进程

“全球南方”国家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积极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二战结束至今，联合国开展了一系列的维和行动，南方国家以及之后的“全球南方”国家在发起维和行动议程、派遣维和部队与军事观察团、提供资金支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948年到2024年，联合国总共发起了71次维和行动，而印度就参加了49次，派遣的维和部队人数位居第一。印度不仅为国际维和提供了大量人力，也在宣扬维和理念、建设维和制度、开展维和合作等方面有所建树。<sup>[1]</sup>巴西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始于1948年，这也是南方国家关注并参加全球安全治理的重要标志。巴西参与联合国在海地的维和行动，这是首次由南方国家发起的维和行动。目前，正在进行的11个联合国维和任务中，巴西参与了8个。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全球南方”国家，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自1990年以来，中国已派出维和人员5万余人次，赴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成为联合国维和的关键力量。<sup>[2]</sup>2015年，中国加入新的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并组建8000人维和待命部队。此外，“全球南方”国家在联合国大会等多边场合发出防止核扩散、禁雷、限制武器销售等倡议。正如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教授保罗·艾马尔（Paul Amar）所言，“全球南方”国家不断增加其对人道主义行动及维和任务的参与和领导作用。<sup>[3]</sup>

## （二）“全球南方”国家组成多边合作机制融入到全球安全治理进程

作为南南合作典范与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标杆的金砖国家合作机制，逐渐成长为推动全球安全治理变革的有力因素。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新变化，

---

[1] 王旭、胡二杰：《印度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实践及其局限性》，载《和平与发展》2023年第3期，第121页。

[2]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全文），国务院新闻办网站，2023年9月26日，[http://www.scio.gov.cn/zfbps/zfbps\\_2279/202309/t20230926\\_771203.html](http://www.scio.gov.cn/zfbps/zfbps_2279/202309/t20230926_771203.html)。

[3] Paul Amar, ed., *Global South to the Rescue: Emerging Humanitarian Superpowers and Globalizing Rescue Industr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一方面体现为通过扩容，推出“大金砖”合作模式，让更多的“全球南方”国家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沙特、伊朗、埃及、埃塞俄比亚、阿联酋5国于2024年1月正式加入金砖国家组织；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透露，截至2024年1月，有近30个国家表达了加入金砖国家的愿望。<sup>[1]</sup>另一方面体现为逐渐向安全领域延展，把政治安全合作作为重要议题。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贯彻“对话协商、和平解决”原则，通过金砖国家反恐工作组去极端化分工工作组会议等推进全球安全治理及构建全球安全新秩序，更有力地促进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大金砖”合作团结更多的“全球南方”国家，不仅在反恐、打击跨国犯罪、维护粮食安全、卫生安全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加强合作，还推动地缘政治冲突等传统安全问题的有效治理。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在二十国集团框架下提出国际粮食安全合作倡议，推动通过《金砖国家粮食安全合作战略》。2022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外长会晤开幕式上发表视频致辞，强调金砖国家要加强政治互信和安全合作，共建人类安全共同体。2023年8月，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中进一步提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坚决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安全利益。随着“全球南方”国家的实力增长，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将进一步发展为“全球南方”重要的治理平台，成为全球安全治理变革的有机力量。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后，2023年11月，金砖国家领导人巴以问题特别视频峰会举行，强调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指导下促进中东地区和平进程。2024年6月，金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举行外长对话会，强调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矛盾分歧，推动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尽快实现加沙停火止战。<sup>[2]</sup>

“全球南方”国家自主发起创建新的全球安全治理机制，以正在筹划的国际调解院为例。2022年10月，中国、巴基斯坦、老挝、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苏丹、吉布提、阿尔及利亚、白俄罗斯、塞尔维亚等国家共同签署《关

[1]《俄外长：近三十国希望加入金砖国家》，《参考消息》官方账号，2024年1月19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88516285731946518&wfr=spider&for=pc>。

[2]《金砖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举行外长对话会》，外交部网站，2024年6月11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gjldrhd\\_674881/202406/t20240611\\_11424842.shtml](https://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gjldrhd_674881/202406/t20240611_11424842.shtml)。

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联合声明》，宗旨是践行《联合国宪章》以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通过和平调解的方式化解冲突与争议。国际调解院作为世界上首个专门以调解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重要目标是增强“全球南方”国家的参与度，培养“全球南方”国家的调解员，推动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向更加公平普惠的方向发展。国际调解院的建设是“全球南方”国家立志于促进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深度发展，打破西方国家垄断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历史。

### （三）“全球南方”的区域组织积极参与全球安全治理行动

冷战结束以后，“全球南方”国家组成的区域组织对全球安全治理的态度更为主动。“全球南方”区域内的不同力量结成区域网络，通过区域组织或区域机构在全球安全治理中发挥影响力，影响最大的是政府间区域组织。区域组织凭借实力成为重要行为体，成为采取有效行动实现多边主义理想的主要中心。<sup>[1]</sup>区域通过其区域组织实现从区域安全治理的客体到主体的转换。<sup>[2]</sup>区域组织作为安全互动的主要行为体，推动区域层次与全球层次安全治理的互动，促进全球—区域安全治理联结。在维持区域和平与安全方面，区域组织在维和、执行和平、集体安全等方面是联合国不可替代的战略伙伴，联合国与区域组织之间的协同治理已成为全球组织多边机制框架内全球治理进程中区域治理的一种务实的成功路径。冷战结束以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简称西共体，ECOWAS）、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IGAD）以及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简称南共体，SADC）等区域组织推动利比里亚、刚果（金）、塞拉利昂以及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武装冲突的和平解决。面对一些国家内部的军事政变，西共体积极介入其间。作为非洲地区主要的区域性国际组织，非盟（AU）把安全治理视为重要的议程，非盟《2063年

[1] Ramesh Thakur and Luk Van Langenhove, “Enhancing Global Governance through Regional Integration,” *Global Governance*, Vol.12, No.3, 2006, p.237.

[2] Bjorn Hettne and Fredrik Soderbaum, “The UN and Regional Organizations in Global Security: Competing or Complementary Logic?” *Global Governance*, Vol.12, No.3, 2006, pp.227-228.

议程》把建设和平与安全的非洲作为七大议程之一。东盟地区论坛（ARF）则是东亚地区安全治理的主要载体之一，积极推进冲突预防与热点降温。上海合作组织（SCO）从积极应对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毒品犯罪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入手，大力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不断完善安全合作机制建设，共同守护地区安全，影响力、凝聚力和感召力不断提升，已从最初的6个成员扩大为由9个正式成员国、3个观察员国和14个对话伙伴组成的“上合组织大家庭”，成为当今世界覆盖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sup>[1]</sup>

“全球南方”的地区大国积极推动全球安全治理进程，成为所处各自区域安全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引领者角色。“全球南方”大国是各自区域权力体系中的主要角色，在其所属区域权力结构和治理网络中的重要性上升。地区大国在其所在的地区保持足够的影响力，主导着该地区的合作机制和一体化进程。<sup>[2]</sup>进入21世纪，区域权力结构逐渐以区域大国为主导得以重塑，新兴大国积极推行区域化安全战略，对冲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降低这些国家在本地区的势力。巴西、印度、南非和印尼等国已经取代原殖民宗主国，发挥自身在其所属地区的影响力，并成为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南共体、东盟等区域组织在二十国集团中的代表国。冲突及安全问题的区域化使得全球南方地区国家协同冲突预防、维和及和平建设，特别是区域大国积极引领区域安全治理进程。近些年来，尼日利亚通过西共体的组织架构，大力推进西部非洲的安全治理。

#### （四）“全球南方”国家或者区域组织之间加强跨区域合作以提升全球安全治理的纵深度

中俄印三国外长会议以及“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IBSA）等多边非正式论坛探究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变革。中俄印三国外长会议关注突发

---

[1] 《中方已全面启动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工作》，新华网，2024年7月22日，<http://www.news.cn/world/20240722/904cc41b1ada4a948b8e188aba97a942/c.html>。

[2] 黄仁伟：《当代国际体系转型的特点和趋势》，载《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7期，第11页。

事件应对、卫生安全合作、地区热点问题解决等，探寻搭建公开透明的安全合作架构。IBSA 在农业、国防、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社会主题、卫生、旅游、能源、交通、社会、信息社会、科技、教育、文化、商业和投资等领域建立了 14 个三边工作组。<sup>[1]</sup>作为“全球南方”大国构成的三边伙伴关系，IBSA 积极通过斡旋外交促进地区安全热点问题的缓和。“全球南方”国家推进安全合作还通过“全球南方”大国+特定区域整体的形式，进而实现全球安全治理的功能提升及范围扩大。在这方面，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以及区域组织的紧密联系是典型体现。2018 年 9 月，中国宣布建立中非和平安全论坛。2022 年 1 月，中国提出“非洲之角和平发展构想”，同年 6 月举办中国—非洲之角和平会议。2022 年以来，中国—太平洋岛国应对气候变化合作中心、防灾减灾合作中心等机制相继正式启动。此外，中阿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中国—拉共体论坛等机制在推动全球安全治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气候问题国际谈判中，巴西、南非、印度与中国组成的“基础四国”（BASIC）与小岛屿国家联盟（AOSIS）在“77 国集团和中国”框架下积极推进南南气候合作。

“全球南方”大国积极推动乌克兰危机、新一轮巴以冲突等国际安全热点问题的和平解决。在乌克兰危机中，“全球南方”没有选边站队，更多采取中立政策，没有追随美西方国家谴责与制裁俄罗斯。2023 年 8 月，沙特主办了乌克兰问题国际会议，有 42 个国家与国际组织代表参加，致力于推进乌克兰危机的和平解决。巴西、南非与中国等“全球南方”大国积极奔走，推出各自的和平方案。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四个应该”“四个共同”和“三点思考”，成为中方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根本遵循。在此基础上，中方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提出尊重各国主权、摒弃冷战思维、停火止战、启动和谈等 12 点重要原则；2024 年 5 月，中国还与巴西达成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

---

[1] Marco Antonio Vieira and Chris Alden, “India, Brazil, and South Africa (IBSA):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nd the Paradox of Regional Leadership,” *Global Governance*, Vol.17, No.4, 2011, p.508.

6点共识。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埃及发起“开罗和平峰会”，呼吁巴以冲突双方止战言和。2023年11月，中国发布《中国关于解决巴以冲突的立场文件》，提出停火止战等五项主张；2024年5月，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期间发布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联合声明，强调共同努力推动加沙地带尽快停火止战，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巴西积极利用自己作为2024年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的身份，通过议程设置等方式推进全球大国及国际社会关注巴以冲突等安全议题。

总之，以新兴大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积极推进全球安全治理进程，成为全球安全治理体系中的积极力量。“全球南方”国家不认同西方国家长期把持与主导的国际秩序，“全球南方”也不再是全球安全治理的被动接受者，而是逐渐转化为全球安全治理的主动塑造者与建构者。2023年9月，“77国集团和中国”峰会发布的《哈瓦那宣言》呼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增加“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决策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强调加强打击恐怖主义等领域的合作，积极推动全球及区域安全热点问题的解决。2024年1月，第三届“全球南方”首脑峰会提出促进巴以冲突的公正解决与全球治理机制的改革等问题。这不仅表明“全球南方”作为国际政治新兴力量正在崛起，也是“全球南方”在动荡变革期为推动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变革发出的时代最强音。

## 二、“全球南方”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动力

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与国际政治动荡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全球南方”积极参与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变革，在治理机制建设、治理理念供给与安全问题解决等方面不断输出全球安全公共产品，成为全球安全治理格局中的重要力量。从总体上来看，“全球南方”参与全球安全治理，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动力。

### （一）“全球南方”国家对战略自主性愈加重视

“全球南方”国家脱胎于二战以后的反殖民主义，在历史上有着反新旧殖民主义与霸权主义的政治传统，长期以来一直把争取独立的政治地位以及自主的国际政治参与权视为追求的政治目标。在“后殖民主义”框架内，“全球南方”特别指涉世界上那些不属于“西方”（或“北方”）的地区，它们曾经被认为是殖民地、第三世界或边缘地带。<sup>[1]</sup>冷战结束以后，国际事务与全球安全治理的主动权依然掌握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手中。“全球南方”不只是一个地理位置，相反它蕴含着遭受全球化后果的世界各区域。<sup>[2]</sup>“全球南方”国家多数是中小国家，不愿意成为大国博弈的角逐场所，更不愿充当大国竞争的战略工具及深陷地缘政治冲突漩涡，避免“选边站”是绝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选择。“全球南方”被视为抵抗空间，不仅抵制“北方”的主导地位，而且还抵制新自由资本主义和其他形式的全球霸权力量。<sup>[3]</sup>“全球南方”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与多极化，提高“全球南方”国家的话语自主权。在2023年2月的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加纳总统阿库福-阿多（Nana Akufo-Addo）直言西方国家自私自利，非洲大陆只能够自卫，并且要重新审视全球秩序机制。<sup>[4]</sup>拉丁美洲国家团结自强与自主发展的愿望进一步上升，采取行动加强地区战略自主，反对美国的霸权霸道行为。中东国家的战略自主意识也在不断强化，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中东一系列国家不愿跟从美国在乌克兰危机升级后的反俄立场。

---

[1] Simon During, “The Global South and Internationalism: The Geographies of Post-Subjectivity,” *Postcolonial Studies*, Vol.23, No.4, 2020, p.457.

[2] Walter D.Mignolo, “The Global South and World Dis/Order,”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Vol.67, No.2, 2011, p.184.

[3] Sebastian Haug, Jacqueline Braveboy-Wagner and Günther Maihold, “The ‘Global South’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Examining a Meta Category,”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42, No.9, 2021, p.1929.

[4] Adam Lupel and Jenna Russo, “Thinking Globally about the War in Ukraine: Three Takeaways from Munich,” IPI Global Observatory, March 23, 2023, <http://theglobalobservatory.org/2023/03/thinking-globally-abo-ut-war-in-ukraine/>.

同时，“全球南方”国家不满西方的政治主导权，认为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忽视“全球南方”国家的利益关切、推行后殖民统治与奉行双重标准。“全球南方”概念的话语体系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全球政治、经济与安全关系的不平等性，且这与特定的全球权力结构有关。“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等术语是评估全球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不平等的组成部分。<sup>[1]</sup>因此，“全球南方”争取全球安全治理体系中的平等发言权与决策权，推动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向着更为公正合理的方向变革。独立自主是“全球南方”的政治底色，发展振兴是“全球南方”的历史使命，公道正义是“全球南方”的共同主张。<sup>[2]</sup>“全球南方”国家不愿意在全球安全治理中成为西方的附庸，而是具有独立意志的行动者与塑造者，从安全治理的边缘地位逐渐走向中心舞台，争取成为全球安全治理体系中的主动与积极构建者。

## （二）“全球南方”实力的增强推动其独立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进程加快

“全球南方”实力的不断增强是其积极参加全球安全治理的有力支撑，尤其是“全球南方”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为“全球南方”的整体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全球南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导致全球权力逐渐向非西方国家转移。“全球南方”的崛起首先是经济崛起，以新兴大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推动“全球南方”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截至2023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过去20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0%。<sup>[3]</sup>正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且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全球南方”的概念由此逐渐流行。“全球南方”概念的出现及其成为热门话题，本身说明广大的“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不断抬升。

[1] Harald Fuhr, “The Rise of the Global South and the Rise in Carbon Emissions,”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42, No.11, 2021, p.2725.

[2] 《王毅就加强“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提出四点主张》，新华网，2023年7月26日，[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3-07/26/c\\_1129768124.htm](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3-07/26/c_1129768124.htm)。

[3] 《习近平在2023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上的致辞（全文）》，新华网，2023年8月23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3-08/23/c\\_1129817742.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3-08/23/c_1129817742.htm)。

在大变局时代，全球权力结构发生深刻变迁，“全球南方”国家更加自信与自立。二战结束以来，国际体系转型的总体趋势是由两极体系经过短暂单极体系再到多极化进程，体系的权力结构呈现扁平化。当前，伴随国际权力分布动态变化，国际体系处于向着多极体系的过渡及转型期。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有助于构建更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印度前总理曼莫汉·辛格指出，基于国际权力在不断转移的现实，既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应该要调整以有力地体现出现实权力的变化。<sup>[1]</sup>同时，“全球南方”实力的提升得到国际社会各方的有效回应，同“全球南方”的积极互动成为重要的潮流。比如，近些年，俄罗斯、欧盟、日本、美国均与非洲举行了峰会，讨论包括安全合作在内的各种议题。

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变革源于国家间实力对比变化，全球安全治理的机制及制度体系处于持续动态演化的进程中。一方面，西方国家对全球安全治理力不从心，全球安全治理机制出现衰退趋势。不管是乌克兰危机，还是新一轮巴以冲突及外溢的地区冲突，西方国家均难以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全球南方”反对西方主导的全球安全治理格局，在全球安全治理体系中要求更大的代表权。西方国家不断拉拢并建构与“全球南方”的关系，妄图分化“全球南方”，拉拢“全球南方”国家在大国竞争中选边站队西方国家，这在客观上提升了“全球南方”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在大国博弈中，“全球南方”越来越可能成为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对象。<sup>[2]</sup>这有助于增强“全球南方”大国向国际社会提供安全公共产品的能力，积极推进全球安全治理的南方转向。

### （三）安全威胁的持续存在与既有安全机制的深度赤字促使“全球南方”主动融入到全球安全治理进程

尽管发展是“全球南方”国家首要关注的议程，但是“全球南方”国

---

[1] Charalampos Efstathopoulos, “India and Global Governance: The Politics of Ambivalent Reform,”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53, No.2, 2016, p.248.

[2] 黄超：《国际政治经济学视域下“全球南方”的时代内涵》，载《世界经济研究》2023年第9期，第15页。

家也面临着地缘政治危机、国家间领土领海争端、核扩散、有组织跨国犯罪、恐怖主义、难民、传染性疾病、国内政变等安全难题，安全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反过来影响发展议程的有效推进。美国强化大国竞争烈度及加强对中国、俄罗斯等国家的战略遏制，分化“全球南方”国家，更为强调大国竞争而非通过大国合作促进全球安全治理。这给“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安全关系以及国内安全治理带来复杂影响，诸如巴以冲突等传统安全问题再度凸显，海盗经久地危害着从几内亚湾到马六甲海峡等区域的海洋安全，网络犯罪以新的技术形态反复地威胁“全球南方”国家的安全稳定与民众的基本安全，恐怖主义在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毛里塔尼亚等非洲萨赫勒地区国家及“全球南方”其他地区不断肆虐。此外，以也门胡塞武装等为代表的非国家武装行为体（VNSA）对区域及国际安全的影响值得探究。面对这些新旧安全问题，既有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难以满足实际需求，原有应对安全威胁的国际制度安排力不从心。现有全球安全治理的话语权依然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手中，主要是维护西方国家的政治与安全利益，治理机制的代表性与有效性均不足，存在安全治理赤字的突出问题。由于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安全治理的理念与模式不能有效应对多样化的全球安全问题，“全球南方”需要主动作为，通过搭建新的治理机制、供给新的治理理念推进新的治理实践。

**（四）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重大国际和地区挑战启发“全球南方”更加主动关注与参加全球安全治理。**

重大及突发事件使得国际安全形势及安全治理格局发生深刻变迁，促进全球安全治理相关方的观念转变及偏好调整。新冠疫情等突发事件的发生使得“全球南方”认识到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重要意义。新冠疫情给“全球南方”国家造成的消极影响远远大于西方国家，“全球南方”获取的卫生安全援助没有能够满足实际的需求，这强化了“全球南方”国家自主治理的意识。特别是广大“全球南方”国家迫切需要西方国家的疫苗援助时，后者只是关注自身的利益，没有充分顾及“全球南方”国家民众的健康权

与生存权。而作为“全球南方”的主要大国,中国及时提供了卫生安全援助,全球每3支新冠疫苗就有1支由中国生产。乌克兰危机的持续化使得“全球南方”成为影响国际政治与安全格局走向的重要行为体。乌克兰危机使得“全球南方”国家进一步觉醒,“全球南方”认识到冷战政治与选边站队不符合历史潮流,进一步追求对外政策独立性和强化不结盟立场,推动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向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乌克兰危机后,“全球南方”不仅没有全面倒向西方,还公开表达独立自主的政治立场,乌克兰危机也被视为“全球南方”政治觉醒的重要标志。<sup>[1]</sup>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与西方国家总体上偏袒以色列不同,“全球南方”旗帜鲜明地呼吁立即停火,通过外交途径实现中东和平,再次凸显了“全球南方”与西方国家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巨大分歧。<sup>[2]</sup>

### 三、“全球南方”崛起对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南方”的崛起成为备受瞩目的时代潮流,进一步推动国际体系的转型,国际体系的关系结构、制度形态与观念范式等发生重大转型。同时,“全球南方”作为当今国际体系演化的主要推动力量,回应着全球安全治理效能不足的现实问题,推动全球安全治理机制变革。“全球南方”的崛起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力量对比,为全球治理的改革和进步创造了机遇。<sup>[3]</sup>“全球南方”参与全球安全治理具有多方面的影响,涉及安全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与民主化、安全治理范式的区域转向、安全治理方式的真正多边主义。

---

[1] 徐秀军、沈陈:《“全球南方”崛起与世界格局演变》,载《国际问题研究》2023年第4期,第65页。

[2] 王明进:《“全球南方”与国际秩序转型》,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年第23期,第50页。

[3] 张胜军:《全球治理的“东南主义”新范式》,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5期,第16-17页。

### （一）有助于促进全球安全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与民主化

全球安全治理体系是国际关系行为体互动的有机系统，“全球南方”参与全球安全治理有助于进一步推进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与民主化趋势。在两极体系下，权力分布高度集中，美国与苏联是全球安全的主要治理者，包括“全球南方”在内的其他国家更多是被治理者，形成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主、美苏盟友及其他国家为辅的“中心—边缘”治理范式，安全治理具有显著的等级性及强权式特色。在单极体系下，基于美国霸权的全球治理领导权，美国通常被视为全球安全治理的领导者，全球安全治理美国化是该体系下治理的生动图景。美国霸权深刻地影响着全球安全治理的走向。<sup>[1]</sup> 基于单极体系下国家间权力的更加不平等，美国推进的全球安全治理表现为垂直性与中心化的霸权治理模式。

“全球南方”的崛起推动国际体系结构和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不断变迁，突出表现为原本作为被治理者的“全球南方”国家更多成为安全治理议程的发起者与安全治理行动的实践者，以回应体系结构变迁的国际政治现实。“全球南方”融入全球安全治理进程使其成为全球安全治理民主化的变革力量。在多极化体系下，各种各样的“全球南方”行为体积极参与安全事务的治理，对全球安全治理起着重要的补充或替代作用。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以及努力推进在南北对话中的目标，有助于增强其在世界事务与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sup>[2]</sup> 当前，全球安全治理的主体不仅包括全球层次的国际组织与霸权国家，还涵盖“全球南方”的区域组织、“全球南方”大国等众多行为主体。随着全球霸权的相对衰落及霸权国对外战略的收缩，“全球南方”更多的区域安排代替全球霸权，区域组织在安全治理中的作用增强，出现了不同于传统西方安全治理模式的新型治理模式。“全球南方”国家对全球安全治理的深度参与及积极融入，一方面强化了“全球南方”的整体实力

[1] Elke Krahmman, “American Hegemony or Global Governance? Competing Visions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7, No.4, 2005, pp.531-545.

[2] Branislav Gosovic, “The Resurgence of South-South Cooperation,”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37, No.4, 2016, pp.733-743.

以及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全球安全治理的民主化趋势。“全球南方”能够保持战略自主、外交中立以及独立选择权，本身展现出“全球南方”作为世界政治新兴力量的崛起，新的全球安全治理可能在制度上更加多样化和多中心化。新世纪以来，全球安全治理体系显现出扁平化及去中心化趋势，反映管理国际安全事务的垂直结构逐渐分散化，更多呈现为地区内部国家合作机制而非等级式，安全治理从传统等级式的区域合作过渡到水平式的区域合作。

## （二）有助于推动全球安全治理范式的区域转向

当前，国际体系结构性转型的重要特征是“全球南方”大国的崛起及其影响力的拓展。“全球南方”的崛起，尤其是“全球南方”大国的地位和影响力上升，促进全球安全治理的重大转变，尤其是加快全球安全治理的区域转向趋势。冷战时期，外部大国强力介入地区安全事务，区域安全治理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全球层次。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南方”的政治崛起，“全球南方”各个区域内行为体互动增多，地区安全秩序主导权逐渐回落到地区层次，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化趋势。

“全球南方”的崛起及其对安全事务的持续关注对全球安全治理意义重大，推动了全球安全治理区域化转向加快，提升了“全球南方”区域安全治理能力。一是治理对象区域化明显。随着国际体系的不断转型与安全范式的逐渐变迁，安全问题区域化趋势凸显，区域层次的全球安全治理成为国际关系领域重要关注点。包括区域冲突等传统安全问题以及海盗、恐怖主义、难民、环境、流行性疾病等非传统安全更多是区域内生性问题。冷战结束以后，发生在刚果（金）、苏丹、索马里、乌干达、塞拉利昂、利比里亚等非洲国家的“新战争”（new wars），其显著特征是冲突区域化趋势。<sup>[1]</sup>再比如，非洲之角的难民问题是由于该地区国家的国内武装冲突、气候变化等因素所致，且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二是治理载体本地化态势凸显。“全球南方”的发展使得“全球南方”的本地国家有了更大自主活动空

[1] Rodrigo Tavares, “Regional Clustering of Peace and Security,” *Global Change, Peace and Security*, Vol.21, No.2, 2009, pp.153-164.

间，逐渐参与到本地安全治理进程中。地区安全的相对自治构成了国际安全关系的一种模式，它从根本上有别于僵硬的、对冷战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超级大国两极结构。<sup>[1]</sup>全球安全治理多层次的治理体系与治理结构体现出安全治理区域化趋势，治理行动框架存在区域化的倾向，按照安全问题覆盖范围形成安全治理机制。比如，东盟通过构建安全共同体，引领东南亚地区的安全治理进程。三是全球安全治理与区域安全治理的联动性加强。这主要体现在“全球—地方”的联结特别是全球—区域安全机制的深入互动上，重要表现就是联合国安理会与区域组织的联结性强化。比如，在非洲维和行动中，联合国安理会同非盟、西共体等非洲区域组织积极配合，协力推进地区安全热点的降温。

### （三）有助于推动全球安全治理方式的真正多边主义

在两极体系的时代背景下，美苏主导的全球安全治理呈现出明显的排他性特征，两个超级大国阵营对立，治理区域与领域泾渭分明，全球安全治理体系没有真正形成多边主义，更多是政治集团化的治理轮廓。冷战结束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美国主导的全球安全治理也没有完全实现多边主义方式，更多是一种“伪”多边主义，尤其体现在美国推行的具有显著对抗性的安全小多边机制，比如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等，实质是美国用以遏制围堵竞争对手的战略工具。另一方面，美国特朗普政府时期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全球移民协定》《巴黎协定》等一系列全球安全治理机制，推行去多边主义的治理主张。

“全球南方”国家基于历史经历与现实政治考量，强调多边主义的全球安全治理理念，主张国际安全问题通过联合国等多边结构及国际社会共同应对。联合国仍是新兴国家的合法化平台，提高了新兴国家行动与外交政策目标的形象。<sup>[2]</sup>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体系是真正的多边主义的体现。“全

[1] [英] 巴里·布赞、[丹] 奥利·维夫：《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潘忠岐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3页。

[2] Carolina Milhorange and Folashade Soule-Kohndou,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nd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Global Governance*, Vol.23, No.3, 2017, p.478.

球南方”积极追求全球治理过程的多元性，推动“真正的多边主义”。<sup>[1]</sup>一方面，“全球南方”强调维护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安全，其对《联合国宪章》的尊重切实贯彻了真正的多边主义理念，通过联合国等既有的全球治理机制促进了安全治理的多边合作进程。另一方面，“全球南方”的各种多边安全合作本身有助于推进安全多边主义的实践进程，借助新兴的平台推动容纳各方的多边治理机制。以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为代表的致力于全球和地区安全治理的多边机制正在作出有益尝试。<sup>[2]</sup>“全球南方”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成为真正的多边主义的行动主体，不同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单边主义绝对安全观。“全球南方”积极参与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变革有助于国际秩序朝着更为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尽管“全球南方”在全球安全治理体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且推动着全球安全治理机制的变革，但是“全球南方”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作用也受到相关因素的制约和干扰。

一是“全球南方”国家内部的差异与冲突影响到合作推进安全治理的效果。比如，中东国家追求自身安全利益所推行的战略通常是以安全复合体内部竞争对手的利益为代价。<sup>[3]</sup>在现实层面，“全球南方”缺少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这不利于协力推进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变革。IBSA的领导力量在全球内被定义为引领发展中国家的主张，但其在地区层面的领导力仍受到一定限制，还有待被接受。<sup>[4]</sup>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全球南方”国家在

---

[1] 徐秀军、沈陈：《“全球南方”崛起与世界格局演变》，载《国际问题研究》2023年第4期，第73页。

[2] 牛海彬：《“全球南方”是国际秩序演变的重要推动力量》，载《当代世界》2023年第11期，第24页。

[3] Brendon J.Cannon and Federico Donelli, “Asymmetric Alliances and High Polarity: Evaluating 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Horn of Africa,”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41, No.3, 2020, p.505.

[4] Marco Antonio Vieira and Chris Alden, “India, Brazil, and South Africa (IBSA):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nd the Paradox of Regional Leadership,” *Global Governance*, Vol.17, No.4, 2011, p.507.

全球安全治理方面的理念并非完全一致，比如东盟国家讲究不干涉内政原则，非盟则强调非漠视原则，这在 2023 年围绕西共体是否要军事干预尼日尔政变中的分歧可见一斑。尽管在联合国首次提出气候与安全问题时，77 国集团展现了某种程度的统一战线，但在过去 15 年中，利益的多样化使得“南北”框架在分析气候和安全问题上的多边立场时相当低效。<sup>[1]</sup> 由于国家利益、价值理念等差异，“全球南方”在具体的安全问题领域并非铁板一块。比如，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很多“全球南方”国家采取降低与以色列外交关系或者断交的措施，但是也有像印度这样的国家站在以色列一边。此外，“全球南方”一些国家内部的政治局势变动甚至动荡影响到这些国家参与全球南方的各种合作，比如，2023 年大选之后的阿根廷放弃加入金砖国家；2024 年孟加拉国、委内瑞拉等国相继发生严重政治骚乱甚至政权更迭，给这些国家未来政治秩序稳定及参与包括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在内的“全球南方”合作前景蒙上阴影。

二是西方国家加大拉拢与分化瓦解“全球南方”阵营的力度。长期以来，西方试图将“全球南方”概念工具化，把“全球南方”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且以零和博弈的思维看待“全球南方”的态势发展。作为霸权国的美国，通常依靠选择盟友及制造对手的策略介入安全治理结构。美国把“全球南方”视为开展大国战略博弈的重要场所，维持及强化其在“全球南方”的影响力。2024 年 7 月，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在美国国会参议院作证时宣称，美国在非洲以及“全球南方”其他地区远远落后于中国，美国需要不断接触“全球南方”，以对抗中国在“全球南方”的影响力。<sup>[2]</sup> 在非洲频频发生的军事政变中，美国加大对相关国家的政治干预力度，笼络区域组织以达到分化“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安全

---

[1] Adriana Erthal Abdenur, “Climate and Security: UN Agenda-setting and the ‘Global South’,”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42, No.9, 2021, p.2074.

[2] “Lacking sincerity, US only hopes to weaponize Global South countries,” *Global Times*, July 31, 2024, <https://www.globaltimes.cn/page/202407/1317135.shtml>.

合作与政治互动，削弱“全球南方”的安全治理动能之目的。美国在关涉大国竞争的重点区域积极介入，以霸权护持为总体目标构建以美国为中心的安全治理网络，不利于“全球南方”在全球安全治理体系中的角色扮演。出于遏制中国的战略需要，美国联合日本等西方国家对“全球南方”的概念进行建构，试图把中国排除出“全球南方”的群体，宣扬“中国例外论”，分化与瓦解中国同“全球南方”历史性联系，甚至拉拢和威逼“全球南方”中的一些盟伴国家参与围堵中国。比如，美国把印度视为印太地区的崛起大国以及“有用的”战略伙伴，特别是看重印度“在亚洲世纪制衡中国的潜力”。<sup>[1]</sup>同样，美国将菲律宾小马科斯政府视为在南海对抗中国的重要抓手，加大离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力度。

三是西方大国直接及持续的干预同区域规范相冲突，这阻碍了以区域组织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安全治理主体的功能强化。冷战结束以来，中东地区国家内部的冲突受到西方大国的介入，阻碍着区域安全机制发展，使得原本积极作为的阿拉伯国家联盟在安全治理方面作用的发挥受到冲击。随着国际体系转型带来的结构性压力，美国会加大在东北亚、东南亚等遏制中俄的重点区域强化及扩大军事安全体系，影响到以东盟为代表的东亚地区安全治理水平。美国强化与亚太地区盟友及伙伴的关系，企图打造遏制中国崛起与区域影响力扩展的联合阵线，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东盟在地区合作中的“中心地位”。<sup>[2]</sup>美国积极干预甚至试图破坏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旨在维护南海和平及最终解决南海问题的《南海行为准则》，这不利于南海周边国家自主有效地治理本区域的安全难题。由此可以看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安全治理观冲击了“全球南方”的安全治理理念，“全球南方”国家及区域组织的主动性与能动性被相应削弱。

---

[1] Shiv Kumar, Sudheer Singh Verma and Shahbaz Hussain Shah, “Indo-US Convergence of Agenda in the new Indo-Pacific Regional Security Architecture,” *South Asia Research*, Vol.40, No.2, 2020, p.226.

[2] Richard Stubbs, “ASEAN’s Leadership in East Asian Region—building:Strength in Weakness,” *The Pacific Review*, Vol.27, No.4, 2014, p.523.

## 结语

在二战后的头几十年里，“发展中/不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成为理解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公正、不平等的重要框架。随着冷战结束，“全球南方”逐渐成为重要的术语，用来指代第三世界国家。“全球南方”的概念展现出冷战结束以后全球政治经济的新变化，即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愈加显著及“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不断增强。“全球南方”的崛起推动“全球南方”研究的发展，关于“全球南方”的研究成果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由此，“全球南方”被视为研究世界政治的一个元单位。<sup>[1]</sup>就“全球南方”的学术研究来说，面对西方国家操弄“全球南方”这个较新但是依然相对模糊的概念，需要在学理层面加强研究，争取关于“全球南方”的学术话语权，强化“全球南方”的身份认同，促进“全球南方”的政治团结、经济融合与安全合作。

从现实层面来看，作为“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与“全球南方”合作的中坚力量，中国长期以来维护“全球南方”的正当利益，通过联合国等多个国际舞台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声发力，促进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向着有利于“全球南方”国家的方向发展。面对美西方不断对“全球南方”的概念进行解构及将其视为分化“全球南方”国家的政治武器，中国始终坚持“全球南方”成员的身份定位，始终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携手共筑“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主张以团结合作精神解决各种争端与冲突，积极致力于建设一个持续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为这个不确定的世界提供更多确定性。中国与各方发挥联合国平台作用，推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合作、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等机制下的安全合作，持续打造北京香山论坛、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

---

[1] Sebastian Haug, Jacqueline Braveboy-Wagner and Günther Maihold, “The ‘Global South’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Examining a Meta Category,”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42, No.9, 2021, p.1932.

云港)等国际安全对话交流平台。<sup>[1]</sup>

为更好地推动“全球南方”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角色扮演,中国需要采取相应措施,提升中国与“全球南方”其他国家在维护世界和平事业中的作用。一方面,要推动全球安全治理的中国方案与“全球南方”的有力对接。在2023年约翰内斯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期间,中国政府强调“全球南方”国家合作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推动政治解决热点问题,促进全球安全治理变革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构建推进“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安全共同体。尤其要以习近平主席在2024年6月提出的同“全球南方”共同做“四大力量”(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开放发展的中坚力量、全球治理的建设力量、文明互鉴的促进力量)为指引,持续推进全球安全治理体系优化。中国需要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代表权与发言权,共同落实全球安全倡议,走出一条普遍安全之路。另一方面,需要加强与“全球南方”大国的互动,以“全球南方”不同地区的大国合作推进整体性的“全球南方”合作。通过“全球南方”大国间合作,强化安全议程设置,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在粮食安全、反恐、打击有组织跨国犯罪、地区热点问题等安全领域的合作。此外,要推动与“全球南方”区域组织的安全互动,借助既有的合作机制,打造出契合各个区域实际安全需求且得到各方认可的安全平台。

【来稿日期:2024-02-25】

【修回日期:2024-08-12】

(责任编辑:王霄巍)

---

[1]《全球安全倡议落实进展报告》摘要,中国政府网,2024年7月18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7/content\\_6963438.htm](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7/content_6963438.htm)。